



当代儒商的重要思想宝典——《论语》

(2005-5-18 10:12:41)

作者：刘示范

[内容提要]：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人们将具有文化知识修养的经济工作者美称谓“儒商”。实际上是专指那些在经济活动中将“仁”、“义”、“诚”、“信”等道德行为置于首位的经济工作者。古籍《论语》中的许多内容，例如“仁”、“义”、“诚”、“信”，尤其是“仁”、“义”等思想，是当代构建“儒商”理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

一个历史性的玩笑

人类创造的历史，也爱与人们开玩笑。不过，这种历史的玩笑往往并不轻松，而是要人们、特别是劳动者承担沉重而昂贵的“学费”。

孔子思想和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中包含了许多有生命力的积极因素，直到今天，仍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社会赖以发展所需要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文化支柱。我们获得这种认识，却是付出了昂贵“学费”的！

孔子和由他创立的儒学，到现在已经2500多年了。在这2500多年中，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学，经历了漫长时间和广阔空间的考验，其间也曾经多次遇到过无情的对手给他和它的“毁灭”性打击，诸如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焚书坑儒”，“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等等。至于对他和它的讥讽、谩骂和漫骂则更是司空见惯。但是，非常奇怪，时至今日，孔子和他的学说，在中国、在世界，在相当大的空间，还仍然显出了巨大而不朽的生命力。这种情况既引起了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不同民族与不同信仰的人的普遍重视，也让实事求是的中国人感到高兴和引起注意。

在这里，似乎是“历史”原地转了一圈，也好像是“历史”与我们开了一个并不轻松的“玩笑”。

《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权威的经典著作之一，是当代我们学习、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最权威、最经典的依据。

《论语》与“儒商”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人们尊称那些有知识、有学问和道德品质高尚的社会成员为“儒”什么。例如“儒士”、“儒生”、“儒医”、“儒将”等。根据这一语言习惯，我们可以将现在社会上所说的“儒商”作如下表述：“儒商”是泛指那些有知识、有学问、道德品质比较高尚而在经济领域从事生产、管理和营销等活动的社会成员。无论是“儒生”、“儒医”、“儒将”抑或是“儒商”，他们均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在他们的思想品质中都具有“仁”（“仁爱”）、“义”（“义”与“利”的关系）这些基本的优秀品德，“仁”、“义”是他们思想品质中的合理内核。“仁”、“义”也恰恰是《论语》一书和孔子思想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核心内容。

有学者统计，《论语》一书共一万五千九百二十九字，其中“仁”字出现过一百零九次，即全书有一百零九个“仁”字。在《吕氏春秋》书中早就指出：“孔子贵仁。”（《吕氏春秋、慎势篇》）

毋庸讳言，“人”、抑或更具体地说“为了人”、“对人负责”，是一切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人类历史上，对这一思想最早、做出最权威、最经典表述的正是孔子：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篇》）

孔子主张：学识渊博、道德高尚的人，即“仁者”，他们的整个思想核心是“爱人”。

孔子的继承者孟子甚至强调说：

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章句下篇》）

社会实践告诉人们，只有爱别人的人，才有人爱他；只有尊敬别人的人，别人才肯尊敬他。就是说，只有爱别人的人，才有人爱，不爱别人的人，是没有人喜欢他的；只有尊敬别人的人，才有人尊敬他；不尊敬别人的人，也就无人尊敬他。这是常理，也是常识。

试问，在人类社会，在一切经济活动的任何一个环节的每一位成员，如果是以对消费者不负责任的思想、态度和作风作去从事自己的活动，甭管他（她）是生产者、管理者，还是哪个环节上的经营者，其结果会是什么样子

呢？如果一个企业是对“人”冷漠、不负责任，那么这个企业自身能存在、能发展么？近年，我国有一家企业在电视台和《人民日报》上公开以“仁者爱人，爱人者，人恒爱之”的广告词对外作广告宣传。此举，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令人振聋发聩，耳目一新，实属罕见，个中的“人性”味颇浓，其意味深长。

“仁爱”之心，是“儒商”最重要、最基本的品质和素质。正确而全面地了解与认识孔子的“仁”爱思想，对于我们当今建立“儒商”理论，乃至对于我国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显得特别重要。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勇敢而自觉地高高擎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仁者，爱人”的启蒙人性论的大旗的划时代的伟人。孔子极力张扬人性和人格。

孔子以“仁者，爱人”为思想武器，与把人视为会说话的“工具”的野蛮的奴隶统治制度相抗争。他甚至咒骂“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篇》）“为俑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礼记·檀弓下篇》）马厩失火（“厩焚”），他首先问：“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篇》）孔子还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首先提出了所谓“忠恕”之道：“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人人平等、使人积极而又充分发展的主张。孔子主张人生活在社会上和世界上，都有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平等权利；“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主张，任何人都没有为了自己生存和发展而侵犯或妨碍他人生存与发展的权利。这些可以视为，孔子为人类提出的具有跨越时空特点的最基本的人道原则和道德原则。孔子还教人，主观上要自尊自爱，做人就要象“人”，要有“人”样子，要做有气节的堂堂君子，不要做“风派”小人，要做“仁”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他的学生曾子说：“临大节而不可夺也！”作为国家与社会必须承认和尊重每个人都有做人的独立意志和独立人格，而每个人，也都要爱护和珍惜这种做人特有的权利，自觉经受住各种环境，即顺境和逆境的考验。孔子强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无论处在什么环境中，都不能丧失气节——“仁”而充当见风使舵的“风派”人物，都不能向任何张牙舞爪的邪恶势力屈服和投降，不要见钱眼开、做金钱的奴隶，也不要得意忘形，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保持住“自我”如“松柏”那样“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堂堂君子之节操！不要“害仁”，而要以自己的实践“成仁”。

孔子及其后继儒家，从“仁者，爱人”的基本立场出发，在政治方面提出并坚持了“仁政”思想和主张（强调“德治”、“教化”）。

孔子主张：为政者要爱民，重民，贵民，以“民”作为“政之本”，“邦之本”。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见“民”，就如同接待高贵的宾客一样，动用“民”，就如同举行极不平常的盛大祭祀一样，十分敬畏和恭谨；他对于一切与民为敌的“苛政”，深恶痛绝，势不两立。他痛骂行“苛政”者是野兽；认为“苛政”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比食人的野兽更凶残：“苛政猛于虎也！”（《礼记·檀弓下篇》）他还十分强调：当政者（国家与政府的官员）要以身作则：“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诚如江泽民同志经常强调的那样：“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当“官”的要为老百姓做出学习和仿效的楷模。这也成为中国历代的重要“官箴”。是中国的重要的政治文化。这种思想文化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监督与衡量社会政治制度及其执政者的精神武器。

孔子坚持德、法结合，宽猛相济的治国方略。

治理国家，要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这是孔子政治哲学中最核心的内容，也是孔子治理国家与社会的最基本的政治主张。他十分重视道德，但同时也重视法律和法治或法制。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这是对“德治”与“法治”社会作用的经典概括。

在《左传·昭公二十年》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惟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事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兢不綌，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今人沈玉成先生对孔子的上述思想作了比较通俗的如下翻译：“孔子说：‘好啊！政事宽大百姓就怠慢，怠慢就用严厉来纠正。严厉百姓就伤残，伤残就实施宽大。用宽大调剂严厉，用严厉调剂宽大，政事因此调和。《诗》说，‘百姓已很辛苦，差不多可以稍稍安康；赐恩给中原各国，用以安定四方’，这是实施宽大。‘不要放纵随声附和的

人，以约束不良之人；应当制止侵夺残暴，他们从来不怕法度’，这是用严厉来纠正。‘安抚边远，柔服近地，来安定我王’，这是用和来使国家平静。又说，‘不急不缓，不刚不柔，施政从容不迫，百种福祿临头’，这是和协的顶点。’ ” [4]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关闭窗口\]](#)